

王阳明：狂者“一克念即圣人矣”

□ 倪富静



核心阅读

王阳明——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有明一代气节、功业、文章第一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兼备的“三不朽”之人。是时代机遇造就了他，更是他那乐于实践、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品格和行动成就了他。如果忽略了实践维度，我们对王阳明的理解必然浅薄。

疏被贬贵州，几经艰险才到达龙场驿。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事事亲力亲为：伐树修屋，尽心照顾生病随从，专做石棺以参看生死，设想圣人心境，最终得以悟道。王阳明后来也说：“往年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可见，龙场挫折实践的巨大效果，王阳明是深有体会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与友人及弟子论学的过程中，王阳明非常强调实践之功。明武宗正德五年年末，王阳明与黄绾等人于京师切磋论学。王阳明指出，如果想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廓清心体上的斑驳尘垢。那么，如何廓清呢？王阳明认为，就是要在道德践履的过程中破除自己的私意气习。王阳明指出，这个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但仍应该像古人那般“至万死而乐为”。如果好易恶难，惰于实践，那么极易走入禅、释之路。

明武宗正德九年五月，王阳明任职南京。在讲学的过程中，他听说滁州从学之士有放言高论者，内心悔意颇多。他说自己本想从更为高明的路径引导学者，但很多人走偏了，严重忽视了践履的重要性。因此，他不得

不强调“存天理，去人欲”，教学者多做反省、审查、克治的实践功夫。还有人喜欢谈论仙佛，王阳明便以自己学习的经历开导劝解，鼓励他们笃志圣学。

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不敢为、不会为的问题，尤其要高度关注脱贫攻坚战面临的重大任务，最终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不懈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就是要始终弘扬伟大的创造精神，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就是要弘扬伟大的奋斗精神，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就是要始终弘扬伟大的团结精神，不断巩固国内各民族和海内外中华民族同胞的大团结，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就是要始终弘扬伟大的梦想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证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调动一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一切可以迸发的创造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守伟大梦想的执着，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中华儿女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必由之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精神力量。

真诚合作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解放全人类。为人类和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光荣梦想。新时代中华民族应该也必将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把自己作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面临当今世界复杂而多样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不解团结国内各族人民，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不断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以贯之地加强党的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当今世界，政党林立。一个政党的历史高度，必然取决于其精神世界的高度，取决于所拥有的真理力量。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理想和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之魂。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之力，努力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坚持持之以恒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复兴不可能唾手可得。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就必须时刻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必须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止，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天，我们无比真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更加光明，中国人民的未来更加光明。然而，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是曲折的，仍然面临许多艰难险阻。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最终夺取新时代长征的伟大胜利。（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圣人矣”。即是说，需要再加以克念之功，狂者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如果不做这实践的功夫，那么就容易“阔略事情”。

之后，在给黄宗贤、尚谦等人的书信中，王阳明都强调要“孜孜不息”“用力恳切”。在嘉靖三年中秋宴会之后，王阳明即明确指出，“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重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照王阳明“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确精察处即是知”的知行合一观，狂者到圣人之间的克念功夫既是思维省察克治之实功，亦是人伦物理应接之方法。

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谪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关于王阳明求学和为教的阶段，学界亦有不同于钱德洪的说法。但不论是三变还是四变，实践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王阳明——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有明一代气节、功业、文章第一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兼备的“三不朽”之人。是时代机遇造就了他，更是他那乐于实践、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品格和行动成就了他。钱穆先生说：“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炼，是其著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诚然，如果忽略了实践维度，我们对王阳明的理解必然浅薄。



（上接1版二条）

第三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第四句话：“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第五句话：“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第六句话：“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经典语言还有很多。毛泽东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这个党的根本属性，反映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也讲清了党的主张与人民主张的完全一致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指明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态度。以此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自然地成为这个党的执政理念；以此出发，这个党就自然地要求一切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做人民群众的“牛”，为人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胜利时，还讲过这样两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前

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遇到因国家、君主、臣僚、百姓构建的政治网络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通过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分析研判、洞悉预测等途径，来予以解决。在化解难题的过程中，展示出古代官员独特的符合实际的仕宦观。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认为奢、恣、愎是为官执政之大患，需要警惕、预防、解决。

“奢”是为官之患。如果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积累起亿万资产，用这个钱来改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无可厚非；如果用这个钱来追求奢华，虽然不违法，但是会遭到道德舆论的攻击。道德舆论攻击的重点在于通过违规敛财来满足无限的物欲，这是古代社会中的为官之患。

儒家构建的礼仪秩序，从根本上来讲，是反对奢侈的，《论语》中说：“礼，与其奢也，宁俭。”晋武帝时期，豪门大族集体追求奢华的生活。北方世族王济，娶常山公主为妻，成为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性豪侈”“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称为“金沟”；吃饭的时候，以人乳蒸脍，令人惊诧。西晋宠臣何曾，“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何曾的奢华之处在于“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铺张奢靡的生活物资都难以满足其奢欲。这些世家大族的奢华习气，为晋朝覆灭埋下伏笔。

“恣”易酿成大错。恣是一种没有节制、过于放纵的行为。古代有恣肆、恣睢的说法。古代官员如果自言言行没有节制，而是过于放纵，会导致祸患的降临。

明朝的时候，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随着实力的增强，“残贪，荒酒色”，产生了恣的行为，“恃其强，日益骄恣”。骄恣的也先大权独揽，导致蒙古各部落离心离德。也先由此被部落仇人所嫉恨，遭到杀害。瓦剌从此衰落。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如果上级对下级为官之恣疏于管理，采取放纵的态度，最终也会酿成大错。南朝陈宣帝的第二个儿子陈叔陵荒淫无道，经常游荡于墓葬之地，搜刮石志古器，“持为玩弄，藏之库中”；贪恋美色，“府内民间少妻处女，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陈书》评价他“修饰虚名”，通过“执手读书”“高声长诵”来遮掩其为害一方的丑恶行径。知子莫若父，陈宣帝对陈叔陵的种种劣迹非常了解，但是疏于管教和引导，一味纵容，最终导致陈叔陵走上叛乱之路，后兵败被杀。

“愎”是做人大忌。愎是一种比较自我、听不进别人不同意见的行

古人的为官之患

□ 石志刚

为。《左传》：“智伯贪而愎。”智伯是指晋襄子，位高权重，对其他臣僚经常表现出因势倨傲的态势。有识之士告诫他不要因此得罪他人，否则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主不备，难必至矣。”晋襄子狂妄地回答：“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智伯的“贪而愎”为其覆灭埋下了伏笔。

执政之要在于胸怀、气度、格局。容纳谏言即使是带刺的语言也要接受，否则，容易陷入自我僵化、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的境地中而不能自拔，不仅会使自己失败，亦会使原先的盛业转为衰业。历史上非常有为的汉光武帝刘秀，励精图治，实现“光武中兴”。但是纵览刘秀的一生，虽然其光辉的形象彪炳史册，但其因执迷图讷而听不进谏言的这一点瑕疵，终究成为令人深思的教训。刘秀迷信谶纬之学，“多以决定嫌疑”，给朝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时任给事中的桓谭上疏提出谏言：“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诋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紧接着，桓谭希望刘秀能够摒弃谶纬之学：“陛下宜垂明德，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刘秀听了这番言语后，“不悦”，继而仍然坚持己见地对桓谭说：“吾欲之谶决之，何如？”桓谭以谶纬为非经之说加以排斥，引起刘秀的震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因口头谢罪而被免于“斩之”，但是最终被贬地方，在路途上忧郁而亡。刘秀这一刚愎自用的行为给他光辉的一生带来了污点。

（上接1版头条）5年多来，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向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华民族也因此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华民族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历史，无数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好儿女，用鲜血、汗水、泪水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建党97年历史充分证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青春活力的秘诀，是实现解放全人类远大理想的强大力量保证。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满怀信心地迎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的伟大飞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不懈奋斗

始终不渝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必须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切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当前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中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地位。要着力解决人民

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特别提出：“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毛泽东思考的基点和核心，就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加强大，一切工作都要早做准备，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出发考虑问题的深谋远虑。毛泽东领导制订国家发展长期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基础工业和战略基地。1964年期间，他在研究“三五”计划设想时特别强调，不仅要抓好农业和国防工业这“两个拳头”，还要抓好基础工业这“一个屁股”。他不断提醒人们：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把一切都准备好，敌人要来也好办；没有准备不行，要有备无患；任何工作，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和部署。

毛泽东始终极为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有关唐山地震的。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天津、北京等地震感明显。这时的毛泽东，基本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他一清醒过来，就关心唐山灾情，亲自过日震情报告。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时，毛泽东放声大哭。身边人员回忆说：“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主席嚎啕大哭。”8月18日，经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毛泽东是带着祖国还没有完全统一、人民还没有真正过上富裕生活、民族还没有实现伟大复兴的遗憾离开人世。但他始终相信，这些“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为国家 and 民族深谋远虑、殚精竭虑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谋划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战略。到了晚年，他更加急切地思虑和挂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大业，思考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963年9月，就在毛泽东即将进入70周岁的时候，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深刻指出，在我们基本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